

• 文学研究 •

顾炎武人生的诗意栖居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具有四重基本品质:顾炎武是心系天下的爱国者,他科学地界定了天下与国家这两个具有根本区别的概念;而且他始终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顾炎武是见诸行事的文学家,他实现了文学创作与现实需要的完美结合;顾炎武是弘扬中华传统学术的典范,他在经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史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顾炎武一生淡泊名利,凸显了一个真学者的品质。顾炎武一生不倦地奋斗,他在奋斗中寻觅到了人生的乐趣。顾炎武用自己的一生在四个维度上诠释中国知识分子诗意栖居的内涵。

关键词:明清文学;顾炎武;人文精神;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0)01-0021-07

Gu Yanwu: His Career and Poetical Life

ZHANG Siqi

(Th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Gu Yanwu is a great scholar and thinker who lived in the time when the Ming was changing into the Qing. People admire him from four aspects: 1) He was a patriot with his heart tied to the whole country; he defined the concepts of a country and a dynasty, and he always placed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bove everything. 2) He was a litterateur who emphasized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perfectly combined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realistic needs. 3) He was the quintessence who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s of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philology, historic geography and socio-economic history. 4) He sought neither fame nor wealth all his life, and thus his life embodied outstandingly the main qualities of a genuine scholar whose tireless struggle brought him pleasures of living. These four dimensions exemplified Gu Yanwu's poetical life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Gu Yanwu; humanistic spirit; poetical life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更名绛,字忠清,昆山(今属江苏)人。清兵南下而南明弘光建元之后,他改名炎武,以示抗金之志,字宁人,号亭林。顾炎武有随事署名的习惯。居住在神烈山下的时候,他署名蒋山佣,或曰佣,或曰鹰扬弟子。变姓名渡江至淮阴之后,他署名曰圭年,此谓“顾宁人”三个字之音转,亦即快读时之拼合。学者服膺其学问,称他为亭林先生。后来,顾炎武回忆自己生平的时候,曾做诗一首,诗曰:

愁听塞关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

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待得汉庭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1]360}

这首诗即《又酬傅处士次韵》之二,为顾炎武诗作名篇之一。傅处士,指傅山(1607—1684)。傅山也是名清之际一位富于民族气节的大学者。该诗第二句末尾的“车”字,在现代汉语中读为 che,然而在中古汉语中其读音为:吃遮切,平声,麻韵,穿纽。按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所推定的中古音,

收稿日期: 2009-10-02

作者简介:张思齐(1950—),男,武汉大学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理事,主要从事古代文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车”当读为 ts' a。于是,我们看到该诗押韵非常好,而且首句入韵。顾炎武是精通古代音韵学的大家,这首诗不仅音韵和谐,而且诗意盎然,寓意深刻,基本上概括了顾炎武那不同凡响的一生以及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

一、心系天下的爱国者

顾炎武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的爱国者。青年时期,顾炎武曾经参加复社。复社是由一批江南文士组成的进步组织,其宗旨是反对明末宦官擅权,思欲改革政治,改善民生。在复社中有他的同里好友归庄(1613—1673,字玄恭,号恒轩),他们时常相聚,共同砥砺行节,而不愿随世沉浮。由于一般人理解他们,因而当时有“归奇顾怪”的说法。当清兵攻破昆山城的时候,死者枕籍,一片惨象。他的继母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苟且偷生,于是绝食而死。临终时,继母告诫顾炎武说:儿啊,切毋事二姓!继母临终时的训诫,成为顾炎武终身的信条。

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之后,朱由嵩(1607—1646)被拥立为南明皇帝,在南京即位,是为弘光朝(1644—1645)。顾炎武经地方当局推荐,获得兵部司务这一职务。司务,官名,为明朝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中央各部院寺衙门所属事务厅之职官,属于首领官。当时的中央机关皆分设若干名司务,人数不等。司务掌理省署抄目以及出纳文书之事。按照明制,司务为从九品。虽然司务的官阶不高,但属于中央机关具体管事的官员,职务很重要。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清活动。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任。可是,未及到任,南京城就被清兵攻破了。目睹清兵的野蛮屠杀,顾炎武决意奔赴抗清前线。他来到苏州,参加了当地的抗清斗争。六月,清朝廷再度颁布剃发令。剃发,本作薙发。《清鉴纲目》卷二顺治二年(1645)六月:“下剃发令。始定剃发之制。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贰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限旬日以内尽行剃发。其有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时陕西巡抚孔文濬奏:‘臣家中衍圣公已遵令剃发。第念先圣为礼乐之宗,章甫缝掖,自汉及明三千年之久,未之有改。一旦变更,恐非崇儒重道之典,请蓄发以反衣冠。’朝廷以‘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姑念圣裔,免死革

职。’”^{[2]61}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他们欲从民族风俗入手,让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放弃自己的历史文化,弃绝自己的种族意识,改易自己的风俗习惯,以便他们能够彻底地与新的统治政权合流。明朝的臣民自然不从,于是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清人刀兵所至,汉人义旗四举,抗清的烽火遍及江南各地。顾炎武为民众的抗战热情深深地感动,他写下了不少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篇。比如,《亭林诗集》卷一《精卫》一诗就是顾炎武回忆当年抗清斗争一首杰作,诗中写道: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

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雀来燕去自成窠。^{[1]278}

顾炎武在这首诗中以精卫自喻,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顽强抗清、力图复明的决心。

是年闰六月,南明皇帝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是为隆武帝(1645),顾炎武曾被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职方司为兵部官署。主事为官名。主事在明代初期为首领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始改为司官,为正六品。主事,即首领官。主事为金元之后对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中掌管案牍、管辖吏员,并协助长官处理政务的官员之统称。司官为中央各部院等衙门的属官,主要指各部院诸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此后的四五年间,顾炎武蓄发明志。《清鉴纲目》卷二顺治二年(1645)六月《附记》:“至满清入关,乃以剃发编辫为征服汉人之条件。故顺治二年江南略定后,即厉行剃发令,凡不剃发者,杀毋赦。对于南方尤绝对强行。其揭示江南者,竟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制札,因是而演江阴虐杀、嘉定屠城诸惨剧。”^{[2]62}蓄发明志,气节可嘉,但是具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头发便是一个大记号,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和杀头。于是顾炎武潜踪息影,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他受命至海上,又至徐淮一带,纠结豪杰,团练乡兵,很快便招得劲卒数万人。抗清的形势,一度发展得很快很好,然而到了顺治十二年(1655),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顾氏的一名家仆暗中与豪绅相勾结,并扬言要去向当局举报。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只好潜回家乡,杀死了那个家仆。顾炎武因此而被捕入狱。此事之后,由顾炎武亲手组织起来的那一支抗清队伍就失去了领导核心,抗清的起义失败

了。事败之后，顾炎武又北上鲁、冀、晋、秦，接纳志士，观察形势，以图恢复。不过，随着清朝的政权一天天巩固，抗清的势力也一天天衰微。顾炎武在北方的活动，也只好逐渐转变重心，最终集中在著述活动及其相关的实地考察之上了。这样一来，顾炎武又回到少年时代的初衷，真正成为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了。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取得重大成功之后，决定纂修《明史》。为了求得更多的专门人才，清廷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征召海内名儒。这时，顾炎武已经成为一位学术湛深、名动朝野的大学者了。为了借助顾炎武的社会影响，清廷曾屡次征召他参与修纂《明史》，但是均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对于唾手可得的荣誉、地位和官位，顾炎武嗤之以鼻，并誓死不从。从此以后，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再也没有去过京城，再也没有返回故乡。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六岁了。顾炎武年老而无子嗣，只有养子顾衍相随之左右，直到他去世。

当然，在那个时期，明朝已经腐败，丧失了代表广大民众的资格。南明小朝廷，虽然垂死挣扎，终究难成气候。明朝灭亡已成事实，清朝入主中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如此，顾炎武在北方的抗清活动还是表明了他对故国的忠诚。在他看来，国与君毕竟是两回事，顾炎武爱的是自己的国家，恨的是腐败的皇帝。顾炎武将亡国与亡天下这两件事情区分得很清楚。《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中，他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3]471}朝代兴亡，首承其责者，应该是那些食君之禄的肉食者。然而，礼制文化乃是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礼制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当礼制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到了非起而抗争不可的时候了，正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471}这句话，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将之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这就是顾炎武终生秉持的爱国主义。

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诗之二，其首联写道：“愁听塞关遍吹笛，不见中原有战车。”中国诗人写诗，多言述自己的愁。词人作词更是喜欢言愁。固然苏轼、辛弃疾和顾炎武都是心忧天下、关爱人民的大诗人。然而，他们的愁，却有着程度的区别。《苏轼全集·诗集》卷十七《九日次韵王巩》诗：“我

欲醉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鬓霜绕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4]203}苏东坡乐观旷达，有时也愁。但是，苏东坡在这里所写的愁，倒不如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5]137}辛弃疾在这里所写的愁，则深刻得多。辛弃疾在带湖赋闲期间作了这首词。带湖，地名，在今江西省上饶市市区内，笔者曾去做过实地考察。其实，湖早已不存，带湖仅为一街区之名称。辛弃疾（1140—1207）南归时，正值年富力强，本可以大展宏图，但他却有二十年左右在赋闲中度过。抒发他壮志未酬的忧愤和对统治集团的不满。他思欲报国，但是得不到机会。顾炎武在《又酬傅处士次韵》之二中写的愁，较之辛弃疾，更进了一层。辛弃疾有官位，但他长期赋闲而没有权力。他要权力，以便施展自己的抱负。顾炎武拒绝做官，但是他根本就不想掌什么权，他要做反对民族压迫的斗士，他要为天下苍生谋幸福。顾炎武之所以愁，乃是因为他怀着一颗忧天下爱人民的心。

二、见诸行事的文学家

顾炎武是一位将博大的民族胸怀见诸行事的文学家。顾炎武与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和傅山并列，是明清之际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和文学家之一。他提倡以实学来救治空疏之弊。顾炎武一生力主经世致用，并开启了清代朴学之风。或许，就顾炎武本人来说，他并没有把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看得有多么重要，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却是巨大的。顾炎武的诗歌创作以真情和厚重感见长，他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顾炎武重视民族气节，强调孔子所首倡的“行己有耻”。（《论语·子路》）他认为，既然士大夫以社会的精英自居，那么士大夫的无耻，就与一般的无耻不同了。士大夫的无耻乃是国耻。士大夫必须肩负时代的使命。那就是躬行实践，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以天下为己任。时代剧变所造成的家国之痛是顾炎武文学创作的主题。以经史子集、文字音韵的深厚底蕴，将这一主题准确地表现出来，则是顾炎武文学创作的基本风格。这样的风格在其诗作中表现得尤其充分。顾炎武的大部分诗篇，都写得古朴、苍劲而有力，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值得反复咀嚼。理解

顾炎武的诗篇是不容易的。当然,顾炎武也有一部分诗篇,写得比较秣丽,口吻率真,直抒胸臆,犹如情爱场中少年之所作一般。欧阳修的诗学主张,在宋诗中贯彻了一些,但是并未全部实现。欧阳修诗学主张的真正继承人,可以说就是顾炎武。将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歌特征的话夺两字,即可用来概括顾炎武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欧阳修《六一诗话》:“顾翁事亲切,石齿漱寒漱。作诗四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侍尤古硬,咀嚼苦难嚼。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6]268}在这里,请允许我夺首字“梅”为“顾”,因所论主体为顾炎武也。又夺第三句的“三”为“四”,以与其创作活动的年份相符也。原因如下。各种刻本的《亭林诗集》大体编年,卷一第一首《大行哀诗》题下注曰:“已下阙逢涪滩”。阙逢涪滩,甲申的别称,即顺治元年(1644)。这一年顾炎武三十二岁。卷六亦即最后一卷倒数第二首《酬李子德二十四韵》题下注曰:“重光作噩”。重光作噩,辛酉的别称,即康熙二十年(1681)。这一年顾炎武六十九岁。从顾炎武现存诗作看,他做诗的历程大约为四十年,即从而立之年起,至生命的最后时光。由此可知,诗歌的确是顾炎武存在的一种方式。顾炎武如此郑重地对待诗歌创作,其原因在于,顾炎武认为,做诗不是余事,而是正事。换句话说,顾炎武做诗不是为了消遣怡情,而是以之服务天下苍生。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中,他说:“文之不可以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3]674}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的文学观是大文学观,泛指一切成文的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顾炎武在其它场合也一再强调,面临国破家亡,政治黑暗,道术不彰,民生凋敝的围困时局,一切儒士都应该肩负起拯世救民的责任。儒士的职业是著述活动。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就必须服务于这一崇高目的。顾炎武的运思路径,显然具有某些艺术生产力论的色彩。由于顾炎武把一切著作的用事功能放在首位,因而他认为,文人以文章有益于世用,这与战士以冲锋见诸行事是一样的。他在《与人书二十五首》之三中宣示自己的著述态度说:“孔子之删六

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次,故凡文字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1]91}由此可知,在顾炎武看来,述经、用世和撰文,这三者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他自己的一生,也证明了三者之间能够达成和谐一致。因此,我们看到,顾炎武的文章体现了他的远大器识。顾炎武以真情为文,故其文为至文,特别厚重。顾炎武所持文学上的真情观,超越了表现个人哀乐的局限,而上升到了爱祖国、爱民族、忧民生、忧天下的高度。这就是顾炎武终生秉持的民族观。如此博大的民族观乃是顾炎武文学理论的基石。

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诗之二,其颈联写道:“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诗中两个典故讲的都是奋发图强的故事。周文王时有鸷熊,其后以熊为氏,至成王时封熊绎于楚,姓芈氏,居丹阳,此为春秋楚国之始。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7]213}宋·裴驷《集解》:“瓚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7]213}又,唐·司马贞《索隐》引韦昭:三户是楚国的贵族昭、屈、景三大姓,后人常用这句话来作比喻,虽然地小人寡,犹可以发奋图强。少康是相的儿子,禹的七世孙。相为寒浞的儿子浇所杀,此时相妻后缙,正怀有身孕。她逃到有仍,生下少康。少康长大,和旧臣靡合力灭浞,恢复了夏朝。这两句诗,暗指当时明代诸王虽然相继败亡,但是尚有遗民坚持抗清,不忘旧朝,因而恢复的希望,并未断绝。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竟然沦落为奴役的对象,而主子却是靠武力征伐而获胜的少数民族中的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顾炎武能够从不同文明的消长中,认识政权的更迭。这说明顾炎武具有博大的民族胸怀。

三、传统学术的弘扬者

顾炎武是弘扬中华传统学术的典范。顾炎武年少时便继承祖上教诲,注重实学,对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典章故实,无不究悉。顾炎武十四岁为诸生,从此他一生力学不辍,为我们留下了近五十种著作。顾炎武的主要著作有《日知录》三十二卷、《音

学五书》三十八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肇域志》一百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金石文字记》六卷、《菰中随笔》三卷、《亭林文集》六卷和《亭林诗集》五卷等。在《亭林文集》中,有一些文章具有通论性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和《钱法论》作于1645年,该年的干支为乙酉,因而统称为“乙酉四论”。《郡县论》、《生员论》和《钱粮论》等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专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学的研究。在经学方面顾炎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经学即理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为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1]58}顾炎武考察了理学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理学的实质。理学不是别的,就是经学。经学是朴实无华的,理学起初也是朴实的,只是到了后来受到禅学的影响才偏离了正道,才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空洞了。顾炎武从学术史的角度,正本清源,还理学以本来之面目。这与他的经世致用观有关。这是因为,在明清之际理学衰微了,重整经学并进而谋求儒学的发展,已经成了当务之急。顾炎武有感于此,他顺乎时代潮流,为经学的复苏而开辟了道路。经学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学术的正宗。它直接承接《春秋》、《五经》和《论语》所开创的传统而代代滋生广大。经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轴心时期华夏民族的元典(primary canons)。这些元典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根本典籍,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此后中华民族的每一次飞跃,都需要回忆这一时期,都需要重温这些元典,从中汲取希望并获得精神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二十一世纪,正迈步走向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依然是需要经学的。而且,为了建构我们和谐的家园,也同样是离不开经学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学术前进的方向。

第二,音韵学的研究。在音韵学方面,顾炎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本来,考订文字是一切文史研究的基础性工

作。我国古人,从小就学习这一套功夫,因而称之为小学。然而,这一套功夫,须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练就。小学的程度代表一个人在国学上的功底,因而它又实在是高深得很。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便有经院哲学的传统,而经院哲学也并非只讲求理论发挥一类的“吹功”,僧侣们所孜孜以求的,实际上主要还是考证各种文本。他们拙工作细致得欲将毫毛分解(hair-splitting)而后快之,真乃辨析毫芒也。在近代西方各国中,以德国的考据学为最发达。我们熟知的格林兄弟(Jacob Ludwig Carl Grimm, 1785—1863; Wilhelm Carl Grimm, 1786—1895),其最大功绩是编纂多卷本《德语大辞典》。至于《格林童话》,并非他们用力最多之处。在德国,欲研究人文科学,首先就得接受长期的词源学训练。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借助约柯伯·格林所发现的“格里姆定律”,人们可以把日耳曼诸语言和印欧语区分开来,也可以把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区分开来。也就是说,通一国欧洲语言者,能够较容易地转换出其他欧洲语言的单词来。这与我们阅读中国古书的时候,讲所谓通假通转,其原理是颇为类似的。文本考据之艰难,竟然使得当今西方学者称之为“高级批评”(higher criticism),大概他们亦有感其难为也。在《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中,在分析了经典中大量的字音变化和字形变化的实例之后,顾炎武深有体会地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73}通过这一主张,顾炎武演示了一种笃实的考据训诂方法,从而将儒家经典的注疏和诠释建立在可靠可信的文本基础之上。顾炎武的这一主张,后来由惠栋(1697—1758)加以阐发,戴震(1724—1777)发扬光大,钱大昕(1728—1804)唱为同调,成为乾嘉学派的学理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顾炎武的音韵学研究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学术的高度成就。

第三,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史方面。在这两个领域,顾炎武的成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专著。除了《日知录》之外,《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最重要的著作。在《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中,顾炎武叙述了他撰写此书的缘起,他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

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1]131}原来,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乡试被黜。此事反而使他从科场角逐中惊醒,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桎梏。从此,顾炎武走上了不求功名,独辟蹊径,脚踏实地的治学道路。他倾注全力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了致力于经邦济世之学,顾炎武在广泛读书的过程中详细辑录了疆域、形势、户口、田赋、徭役、河槽、盐法、水利、交通、物产、风俗、军制、兵防、边政等方面的资料。他立下宏愿,一定要完成《肇域志》。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投身于抗清复明的斗争,因而著述时有中辍。顺治十四年(1657)以后,顾炎武在北方生活,还时常根据见闻而对此书有所补充。康熙元年(1662),他将旧稿一分为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归于《肇域志》,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归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定,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之人有同志者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1]131}顾炎武于该书用功之著,不难想见。一般认为,在《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本书中,后者影响更大一些。不过,《天下郡国利病书》属于长编性质,以资料宏富见长,论述尚未充分展开。尽管如此,《天下郡国利病书》对研究明代的社会经济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诗之二,其颌联说:“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两句诗,本意是说,尽管自己已经年老,但是复明的志气并未衰竭。不过,我们也不妨在中国历史文化这一更加广阔的视域中,来重新诠释这两句诗。中国的传统学术,即使在今日看来,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思潮之间,具有许多的契合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必将以全新的姿态服务当今,走向未来。

四、淡泊名利的真学者

顾炎武一生淡泊名利,这凸显了他作为一个真学者的品质。

我们每一个做学问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做书生不容易。举目一看,偌大一个世界,学者极

多。他们摩肩接踵,风光潇洒。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似乎到处都是冠有学者头衔的人士。而且,学者也有不同的价位,似乎学界也成了熙熙攘攘的市场。风云学者亦多,不断挪窝跳槽。不少人甚至以为,所谓为学,似乎本来就是为了飞起来,吃得开一些,于是乎这里作报告,那里搞讲座,不断到处张扬、炒作、造势。而且,社会也流行将某些学者捧为或曰包装为名流的做法。时代不同,具体的做法或许略有差别,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必然有一大批人竞相争做假学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也必然有一股又一股的社会风潮驱使人们去做假学者。其实,做假学者违背学者的初衷,也与治学的本质背道而驰。真学者应当安心做一辈子书生。做官要别人来封。做名流要别人来捧。做真学者则不然,只须求诸己,真正下决心,当下便可做。顾炎武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亭林文集》卷二《广宋遗民录序》:“子曰:‘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或一方而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必之书。呜呼!其心良亦苦矣!”^{[1]133}这是文章开头的几句话。《广宋遗民录》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当时,顾炎武居住在陕西华阴。他的朋友吴江人朱明德千里迢迢,将所著《广宋遗民录》一书带来,请顾炎武作序。顾炎武欣然为之序。序文联系时代,颇多感慨。明朝末年,士大夫侈谈气节。入清之后,这班人却纷纷改仕新朝。朱明德辑补明成化年间进士陈敏政《宋遗民录》而扩写之,编成《广宋遗民录》一书。编书人旨在表彰前代遗民,策励士气。遗民,本指经历浩劫之后残留下来的人,后来也指改朝换代之后不仕新朝的人。在提倡忠君的古代,“遗民”一词固然有留念前代、讥讽新朝、肯定遗民的意味,但是新朝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一般也不禁止著书记载遗民的事迹。由于序这种文体比较活泼,可以纳入各种内容,因而顾炎武在序中发表了他对读书人的看法。从这些看法中,我们亦不难推测出,怎样的人才是一名真学者。“沧海横流”,比喻时世变乱,语出晋·范宁《谷梁传序》:“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

己。”^[8]⁶“风雨如晦”，比喻社会黑暗动乱不已，语出《诗经·郑风·风雨》三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9]¹²⁷由于清代文字禁锢极为严酷，所以顾炎武表达得很含蓄。尽管如此，他对不能坚持气节的士大夫之深恶痛绝，依然力透纸背，如电光一道，照亮了黑夜。学而无友，孤陋寡闻。志同道合的学者相交，大有益于学术的进步。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求友十分必要。这是顾炎武的感慨之一。做真学者难，而真学者寻觅朋友亦难。这是顾炎武的感慨之二。在巨大的名利诱惑面前，坚持为学的初衷十分困难。当时，大致出现了这样两类人。一是随世以就功名者。当明清易代之际，他们或者年尚少，或者未出身，因而他们对亡国之痛缺少切身的感受。这一类人本身并不太坏，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对名利抱着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态罢了。不过，他们毕竟是一些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缺少理解而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一般说来，这一类人，其人格是不完善的。他们不高洁，颇媚俗，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往往会退缩。二是少知自好之士。这一类人数量较多。他们起初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但是不能贯彻始终，最后还是改仕新朝了。顾炎武对这一类人是颇为痛心，十分惋惜的。这是因为，在这一类人中，不仅有他的朋友，而且还有他的学生。前者中有朱彝尊（1629—1709）和李因笃（1631—1692），他们是顾炎武居西北时期的好友。后者中有潘耒（1646—1708），他是顾炎武的学生。此三人均于康熙十八年同时荐试博学宏词科而授官。这些人改行失身，出乎顾炎武的意料。因此，顾炎武对他们的感情也经历了一番变化，由痛心、惋惜而发展到愤激，并最终认为他们的改行失身是可耻的行为。

顾炎武提倡，读书人要做真学者。所谓做真学者，并不是叫人为读书而读书，他是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而提出如此的要求。这与顾炎武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致的。匹夫，指古代之没有爵位的男子，与之相对的还有匹妇。匹夫匹妇，统称普通人。匹夫，可以是工人、农民、车夫、马弁，也可以是书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而匹夫匹妇也可以成为真豪杰。至于书生，他们成为真豪杰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戒绝浮名，沉下心来，当真学者。

《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之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之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1]⁴⁸书生的职业是读书。学者的职业是学术研究。书本和典籍，在书生看来，就是生产资料。著述活动，在学者看来，就是劳动。为人民服务，以天下为己任，尽管书生们坐在书斋里，他们依然是伟大的，其舞台是广阔的。做专门研究，以天下为己任，学者们伏在几案前，他们依然是伟大的，其功用是无穷的。这就赋予“书生”以时代精神的内涵了。同时，提倡做真学者，还有利于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诗之二，其尾联写道：“待得汉庭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此联意谓，储才待命，待到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干一番事业了。而事业成功之后，我们再隐退江湖。划船钓鱼，也不为迟。由于有这样的理想，尽管顾炎武一生备尝艰辛，但是他并不觉得怎么苦，而是亦苦亦乐，始终昂扬向上。顾炎武一生，精力旺盛，文思敏捷，笔耕不辍。顾炎武是始终如一的。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绵延和发展而奋斗，一直奋斗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瞬。

参考文献：

- [1] 清·顾炎武著·华振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清·印鸾章著·邓球伯、钟楚楚标点·清鉴纲目[M].长沙：岳麓书社，1987.
- [3]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4] 宋·苏轼著·傅成、穆传标点·苏轼全集（全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5] 宋·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 [6]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 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史记》（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 清·钟文烝撰·骈字鸾·郝淑惠点校·春秋谷梁传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9]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 刘 瑜]